

中国农民史的价值和意义

——兼论族谱、村志的社会功能

孙 达 人

编者按：史学界对中国农民史的研究有着曲折复杂的经历与极其宝贵的经验。当学术民主之风渐长、形形色色的僵化的樊篱被冲垮之后，史学工作者对以往中国农民史的研究的种种反思与不断地深入研究，对于社会学界开展当代农民研究乃至将研究触角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农民史的研究领域，有着极为重要的参照与借鉴价值。作者对当前一些地方出现的编修族谱、村志现象亦提出了独到见解与对策。

作者：孙达人，男，1937年生，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不久前，应浙江乡村社会研究中心之邀，参加了由它发起的乡村社会文化研讨会，使我有机会接触到一批来自省内外的史志工作者，特别是有幸结识一些基层的村志编纂工作者，学到了很多。对我来说，与直接来自农村基层的史学工作者作这样的学术交流，生平还是第一次，觉得既新鲜又有深刻的意义。由农村的主人自己来编纂自己的历史，这本身就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非常值得引起重视，非常值得认真地加以研究。在这次研讨会上，我讲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与体会。

一、民族的觉醒

农业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革命。根据现代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中国和西亚是同样重要的农业策源地，迄今至少已有8000年以上的时间。个体农民在我国发生的时间要晚一点，不过，它在中国历史上绵延的时间却长得多，对历史的影响也特别大，以致在将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形成了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特大型的民族和社会实体，其中绝大多数至今还是个体农民。再看我国的城市居民，只要上溯几代，他们中的多数仍可以发现自己的祖先原来也是农民；即使上溯几代没有找到农民祖先，由于持久的传统和强大的农村氛围双重影响，从他们身上也都不难发现农民习俗和思维的胎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是在传统的精耕细作农业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研究中国的历史无疑应该把农民史放到重要的位置；然而事实是几千年来以至于今，中国史学始终未能给农民史以应有的地位。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中华文明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具有悠久的史学传统。它以二十五史为代表系统地记录了几千年中华发展的历程，是一笔巨大而宝贵的文化财富。不过，传统史学，除了像司马迁等少数几位天才史学家之外，它的根本弱点在于史学家大都轻视农民，因此，农民长期被完全排斥在史学的大门之外，没有任何地位可言。这是传统史学的阶级性质所决定的。直到1949年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新式农民战争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广大的农民群众才开始作为历史的主人被载入史册。历史将证明,这是传统史学转变为现代史学的重要一步,功不可没;同时也应当实事求是地指出,中国现代史学远远没有真正完成这个历史赋予的使命。最明显的一个证据就是,近十几年来,农民史的研究不是得到了充实和加强,反而被大大地削弱了。这当然亦不是偶然的。

作为长期以研究中国农民史为主要专业方向的史学工作者,通过认真的自我反省,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就史学的范围而论,如果说过去曾经出现过的那种一味拔高农民战争的地位,竭力把它现代化,从主观上看,这是左倾幼稚病的产物,那末,后来出现的鄙薄农民和农民战争的现象正是这种幼稚病的必然报应。表面上的巨大反差其实难以掩盖内在的一致;再从客观上看,这是中国历史的主体尚未摆脱经济和文化上的贫穷状态,广大农民既缺乏史学上的需要,也缺乏实现这种需要的条件。回顾起来不胜惭愧:对我来说,认识到前者还比较容易,而认识后者则化费了大约十五、六个年头,直到不久前得知一些富裕起来的乡镇,特别是农村,已经在积极主动地编写自己的乡志镇志、特别是村志时,方才彻然省悟。关于广大乡村编写志书的情况,将留在本文第三节专门说明。这里想先指出一点,那些来自基层的史志工作者的工作热情之高,成果数量之大,令人感慨,促使我们不能不作深刻反思。

1983年《中国史研究》第三期发表了拙作《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加强对农民史研究》,针对当时史学界非历史地贬低、责难农民和农民战争的观点正在取代以往一味拔高、颂扬它们的实际情况,我认为应继续坚持加强对农民史研究,反对不顾我国历史特点而鄙薄和削弱农民史研究。就在该文写成之后不久,因为工作的变动,我脱离了史学研究工作。在时隔九年重新归队之际,农民史研究已陷入这样冷落的程度,使我不禁发出如下的感叹:“当一门学科走红时趋之若鹜,而不景气之际避之唯恐不远,这至少不应是历史学家的态度。问题并非因研究农战史而发生,当然也不能通过抛弃或回避而解决。这样做反倒可能又重新回复到新的一轮大起大落。”坦率地说,二年前吐露的这种意见与其说表达了对农民史研究现状的不满,不如说更多地暴露出自己对现状的惶惑不解。直到一年以前,我仍然找不到这本来应该在中国得到加强的农民史为什么反而日益削弱的真正根源;我也不知道使农民史研究真正得到加强的道路究竟何在。

其实,人们平时所谓农民为中国历史主体或主角,仅仅是从历史的客体,即历史的客观进程意义上而言的,至于农民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就是另一回事。当广大农民对此还处于不觉悟之际,或者如整个漫长的封建时期,这个事实上的历史主体就被完全排斥在史学的大门之外,而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响;或者如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即使新史学给予农民以这种地位,随后不过一股思潮颠簸,这种地位顷刻之间就动摇了。歪用一句唐诗,真可谓“来是空言去绝踪”;如果农民自己开始觉悟了,主体地位并不是从外给予、而是出于适应觉醒的农民自己强烈地需要,问题就会根本不同;只有到这个时候,历史的主客体地位才能出现合一,从而为农民的历史地位建立巩固的基础。

说到农民觉醒,政治上的解放自然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但它的基础却只能是两个积累:经济积累和文化积累;换言之,必须使广大农民摆脱经济上的贫穷和文化上的落后面貌。如果说政治上的解放可以通过一场运动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摆脱贫穷落后则唯有依靠亿万农民自己长年累月的积累,就是说,这必然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渐进过程。是否可以这样说:1978年以来我国部分地区的农村(迄今主要还在沿海地区)开始脱贫致富,是建国初土地改革的继续,而那些富裕起来的农村主动要求编写自己的历史正是农民觉醒的一个集中表现。农民自己动

手编纂村志的事实表明,实际已经使这些千百年来一直处在社会下层的农民开始发现自身的价值,产生一系列过去梦中也不可能有的新追求。他们既需要通过史学来为自己定位,让史籍留下自己的足迹,也需要通过史学总结经验,探索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是的,相对于广袤无比的农村和农民来说,现在已富裕起来的只占少数。唯其如此,中国农民中出现的这种觉醒现象也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不仅预示着数以亿计的农民的未来,更决定着中华民族整体的发展方向。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把它视为民族的觉醒。

二、历史发展的方向

读者或问:以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能够实现在普遍富裕基础上的民族觉醒吗?如果可能,那末,根据何在?这是必需给予科学答案的实际问题。

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学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我之所以特别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的原话引证出来,就是想请读者注意,他的社会形态学说是就整个人类社会而不是就每一个具体的民族、国家或地区而言的;同时,他亦没有丝毫把自己的学说公式化的意图。但是,早在马克思生前,他的社会形态学说就被视为公式而严重扭曲了。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批评尼·康·米海洛夫斯基把《资本论》“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变成似乎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气愤地把这种公式化企图斥之为“万能钥匙”,认为是对他的“侮辱”。1881年,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稿中又大胆地提出了“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不幸,在马克思逝世之后,公式化的现象反而越演越烈,他的社会形态学说最终被封为“规律”:似乎一切民族和国家的历史都必须依次经历五种社会形态。这种谬论的流毒是这样的深远,以致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在中国、原苏联和西方国家,大抵都把两者视同一物。后来当越来越多的历史事实证明,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没有依次经历过五种社会形态时,有人就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错了,而前面读者的疑问,其实还是对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究竟能不能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文明的问题。十五、六年来我一直关注这个问题,曾经写过几篇文章。这里我想把自己最新探索所得概要介绍给读者。

研究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历史,谁都可以发现,它们的发展过程从来不是按部就班、径情直遂的,而是升降起伏、跳跃不居的。这种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不同的发展速度、甚至是发展过程的异向现象,我曾把它概括为十个字:落后变先进,先进转落后。试举若干最明显的史例:

大约300多万年以前,当时世界各地还处于一片洪荒之际,非洲曾独占鳌头,率先“人猿揖别”。但是,随后占据先进地位的是环地中海东部埃及和西亚一带的古文明,而非洲自那以来却长期衰落了;在前述古文明基础上相继兴起的希腊和罗马,是古代文明的高峰,然而,它却被当时视为“野蛮人”的西欧所取代,在经历了几近千年的沉寂后,又以跳跃式的步伐迅速崛起,创造了横跨大西洋两岸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再拿我国来看,自元谋猿人以来的180万年间,也真是沧海桑田,难以一一细说。即以近几千年而论,先前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北方的黄河中下游几个著名平原,唐宋以后就让位于南方几个大湖盆地和江河谷地。战国秦汉至唐宋之际,中华

文明无论就其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创造高度，还是就其博大的范围而言，确实具有当时世界的先进性；然而，自那以后，同样确凿的事实是，老大的中国是如此长期地陷于停滞的深渊，以致令国人困惑莫解。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总之，任何国家、民族或地区都按不同的轨迹经历了兴衰的过程；世界上从来也没有长盛不衰的文明。从这种微观的角度看，历史的发展似乎是杂乱无章的，没有规律可循的。但是，只要我们廓开视野，宏观地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各个国家、民族或地区间不断出现的兴衰更迭中，就会清晰地呈现出一条不断上升的曲线。假如我们把人类社会这 300 多万年的历史划分为原始、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四个段落，那末，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的主要足迹：东非是我们的摇篮，环地中海东部跨非亚欧的 U 字形地区是古代文明的中心，亚洲创造了中世纪最灿烂的文明，而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到今天为止，西欧、北美无疑是现代文明最发达的地方。简言之，这是一条人类从东非猿人发展为现代人的连绵不断的上升曲线，而这条上升曲线则是以人类每一重大文明进步作为坐标的。

说到这里，我想，细心的读者一定已经发现，前面的表述恰好证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基本上符合世界历史实际，亦即人类就其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确实大体上是沿着他所揭示的原始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这样几个社会演进形态而向前发展的，但是，每一次演进的实现，从来都不是由那些在前一种社会形态发展中领先的国家、民族或地区，按部就班地接着又成为新社会和新文明的创造者，而总是由原先较为落后的国家、民族或地区跳跃式地兴起，成为历史的新主角。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迄今还是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经济文化上这样落后的国家要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文明，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十分矛盾的；其实从本质上看，却完全符合历史内在的逻辑，就象先进的资本主义不是发生在封建主义高度发展的亚洲而是在落后的西欧一样。

这里我想强调指出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创造了高度物质和精神文明，毫无疑问，这些成果无论作怎样充分的评价都不会过分。但同样毫无疑问，这种文明也日益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如果说在 100 多年前，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的弊病，提出要超越“卡夫丁峡谷”，还属于少数天才的科学预见，那末，在现代这不仅已经变成千百万群众的实践，而且，即使在西方的学术界，也有越来越多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资本主义感到失望，兴起后现代主义思潮。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最大弊端在于，一方面这种文明使人类能够真正享受其成果的，归根结底还只是人口的少数，大约只占世界的 15%，其余占 85% 的人口至今仍处于所谓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另一方面为了取得和维持这种文明，人类付出的代价却过于巨大，以致现代世界已十分迫切地感到：保护地球，保护生态实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一言以蔽之，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不应亦步亦趋，而应当大胆地吸取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成果，走符合本国历史逻辑的道路，超越“卡夫丁峡谷”。

三、科学的宝藏

自 80 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出现了一个修纂地方志的高潮。据《中国新方志目录》（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截止 1992 年的统计，已出版各类地方志 9000 多种。其中以农村为主的乡镇（包括区）共计 1234 种，此外，值得特别重视的还有村志 9 种。村志的统计可能小于实际数。至于正在编纂的村志，数量则肯定要得多。这是发生在史学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可惜，迄今尚未引起学术界，甚至史学界应有的重视。

中华民族是一个由连绵不断的历史造成的特大型社会实体,与此相应,在精神上具有悠久而丰富的文化传统。所有这一切最集中和充分地反映在我国的传统史学上。除了私人著作之外,在全国有以二十五史为代表的所谓正史,照例,它是奉皇帝之命,由最高行政长官领衔,在全国范围内征召第一流的学者和征集一切必需的资料,组成专门的机构进行;在地方,基本按照中央的模式,各级地方志也是由当地最高行政长官领衔,征召当地第一流的学者和征集一切必需的资料,组成专门的机构定期修纂;在农村,那些基本上聚族而居的村落则由族长负责,有专人根据文献和口碑两方面资料定期记录本族的世系和大事,此即为族(包括房、宗等等)谱。这就是说,中华民族自上而下都具有极强的全民历史意识和传统,而近十年来的修志高潮首先集中体现了我们民族善于继承优良传统的特点。就个人的有限见闻,这种现象似为世界上其它民族所罕见。中华民族之所以形成一个特大型的实体而又富有文化传统,其根源除了地理的、经济的、政治的因素之外,从文化和心理上说,这种强烈的全民历史意识是一种重要的聚合剂。

其次,这次修志高潮还显现出另一些更值得特别重视的新特点。为了比较深刻地了解这一点,有必要先稍稍介绍一下族谱的价值。

一般说来,地方志中所包含有关农民的信息量总是比之正史要丰富,而民间自发修的族谱(不包括唐以前的各种谱牒)直接以本族的每一个人丁为对象,它所包含的农民信息自然更加丰富;但专业史家自宋元以来却越来越轻视它,至清朝乾隆帝竟视之为“民间无用之族谱”,故《四库全书总目》也就奉旨把它排斥在外,不屑一顾。流弊所及,官方和上层社会对流行在民间、数量极其庞大的族谱既缺乏有系统的著录和收藏,更缺乏深入地研究,以致迄今我们还不知道此类族谱到底有多少种,收藏在何处。根据北京图书馆地方志阅览室的同志介绍,他们室收藏3千多种,不过尚未编目上架,而上海图书馆的收藏,据说还要多些。又据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王志邦介绍,经他初步统计,该省散藏在民间的族谱已超过5千种。即此数例可见公私所藏族谱的数量之巨大。它肯定已大大超过正史,也显然要超过地方志,堪称一个尚未开发的历史文献宝藏。假如我们研究工作真正以下层的农民大众为主要对象,仅靠正史和地方志等等是绝对不够的,必需开启包含丰富农民信息的族谱宝藏。也许,指出这个事实是具有启发性的:尽管党和国家不止一次地发文强调要利用和保护族谱,尽管以记载封建王朝及其各级统治为中心的正史和地方志都已正式整理出版,但谁都知道,族谱曾多次在所谓封建主义的罪名下,遭遇好几次带全国性的厄运,在某些地方迄今家藏也还是地下或半地下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现今民间收藏的数量竟仍如此丰富!这难道不足以证明,在族谱的背后埋藏着任何力量都难以抑制的民族生命力么?

试以个人有限见闻来说吧,现在已经出版和正在编纂的村志有二个明显的特点:其一,每一个村落把本村的历史都有根有据地追溯到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前。例如,福建南安的《翁山谱志》追溯到了宋朝,浙江江山的《白沙村志》追溯到了明洪武年间。像后者为仙霞岭中不过几百人的小山村,其所以能够确切地叙述悠久的历史,主要的根据就是族谱。试想,假如我国数以千万计的村庄都理清了自己的历史,这将使史学发生多么重大的变化啊!仅从史学上说,没有丰富多彩的村志就写不出真正的中国农民史,而没有农民史的中国历史很难说是真正完整的中国历史;其二,每一部村志虽然编辑水平参差不齐,但都洋溢着质朴的民族豪情,这些往往为专业史学著作所欠缺。村志的入志对象包括全村的民众,他们之间有着非族则亲的血缘关系,还有比城市要紧密得多的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几乎人人互相知根知底,叙史真切实在,一般少隐讳和曲笔;修志的目的非常明确,全在教育子孙后代不忘先辈创业之艰难,务求发扬光大。

例如浙江萧山的《尖山下村志》就记录了这个始建于南宋的山村 800 多年来的兴衰荣辱,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发生的巨变:尽管该村人多地少,到 1978 年人均收入才 120 元,由于走上了乡镇工业化新路,现在已变成经济上比较富裕、义务教育普及、医疗和养老等各项保险制度健全、社会秩序良好的新农村。这个原来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山村,几百年的发展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的,有时甚至是不下降的;然而,最近十几年却出现了跳跃式上升过程,一年一大步地奔向现代化。从这种穷乡僻壤发生的巨变中,人们不难领悟为什么这里的主人翁要编纂村志?从他们编纂的村志中,人们不难发现为什么他们对自己的事业和前景充满了豪情和信心?现在,有些开始富裕起来的农村正在或者已经在自发地编纂族谱,而有关的部门对此往往感到为难;但假如我们能够把上述村志找出来认真读一读,是否可以得到启迪,应该把那些农民中的这种可贵历史意识引导到一个更高层次,而不应该象惯常所做的那样,仅仅只是限制修谱呢?从修族谱到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编纂村志,这是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的巨变而发生的史学上的重要转折。同时,把族谱提高到村志,这是教育农民自己,激扬民族自信、自强精神最直观生动、最明白易懂的教材,也是沟通世界各地炎黄子孙的一条感情上的纽带和桥梁。

由于我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直至今日,与西方国家相比,经济文化上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在我们这样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要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新文明,是一个十分艰难而漫长的奋斗过程。许多人对此会长期存在疑虑。许多人出于各种不同的情况,可能把这种追求视为无根空谈。唯其如此,研究我们民族的、特别是农民的历史,揭示它的内在发展逻辑和特点,使已经走上振兴之路的农民不惮前行,显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我国既有几千年连绵不断的“正史”和地方志,又有包含整个民族主体农民历史的系统记录——族谱,这两者都是科学宝藏,而其中庞大无比的族谱则是一个尚未开发的科学宝藏。再不能对之不闻不问,听任自生自灭了,而必须以发掘、整理、研究、提高为宗旨,作出与我们伟大民族、与当前伟大时代相称的科学贡献

1994. 4. 11

责任编辑:王 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香港树仁学院合办 社会学兼读硕士学位课程研究生班开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香港树仁学院合办的社会学硕士学位课程研究生班于 1994 年 9 月开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课教授已前往香港开始授课。

经考试获录取的学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注册硕士学位研究生(在职兼读),中国国家教委批准并承认其学历资格,完全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专业之培养方案对研究生进行培养,被培养者学完有关课程,完成学位论文,且成绩合格,通过论文答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按章授予中国承认之硕士学位。研究生在读期间之学籍管理、成绩管理等等,均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有关规定办理。

现开设的专业为应用社会学。

(张)